

新媒介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转向

——从微博热点事件看“微观政治”的影响

张爱凤

摘要：当前中国媒体中存在两种政治：传统主流媒体表达的“宏观政治”和以微博代表的网络自媒体表达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考察的对象是镶嵌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权力关系而非宏观的国家权力、政党权力、阶级权力等关系。微观政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不涉及暴力，是一种微观政治意识和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批评，是一种相对平和的柔性政治。微博空间的微观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宏观社会政治的走向，如释放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职能转化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政府要认识到微博空间的微观政治对于宏观社会政治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作用，能对宏观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起到平衡和牵制的作用。但微观政治的实行也必须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为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

关键词：微博；宏观政治；微观政治

作者简介：张爱凤，女，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后。（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225002）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6-0016-05

一、媒体中的两种政治：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

“政治”这个概念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但事实上，关于“什么是政治”，却是众说纷纭。“政治”一词，古已有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籍《尚书》《周礼》《论语》中就已经多次出现。孔子说：“政者，正也；治者，理也。”^{[1](292)}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208)}由此可见，“政治”在我国传统语境中的含义是和统治国家、管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将政治统治权即取得和掌握国家政权看作政治斗争、政治实践的中心内容。“任何时候，政治的主要的根本的问题，都是国家和国家机构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政权问题。”^[2]只有那些需要通过国家政权、政府行为和法律手段来处理的利益关系才是政治，只有在这些利益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才是政治。^[3]在中国现行的传播体制下，党报、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的首要功能依然是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路线的宣传功能，因此关注的核心依然是国家、政党、政府、制度、国际关系等宏观的政治问题。我们把媒体表达的这个层面上的“政治”称为宏观政治，也叫社会政治。

宏观政治是政治学 and 传统新闻学关注的重点。新闻学教授童兵认为：“以党报为核心的官方媒体构成官方舆论场的基础。在这个舆论场中，党报等官方媒体根据执政党的意图或指令生成并传播官方舆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需要新闻宣传工作在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和胡锦涛从不同角度讲清了

官方舆论场的使命和功能。”^[4]但长期以来，党报、国家电台、电视台在表现宏观政治时宣传性过剩，新闻性不足，随着传媒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媒体的品牌和公信力不断遭遇来自市场化媒体的挑战和质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遵循以生产者为核心的单向传播模式被打破。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变得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主流媒介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2009年，新浪微博正式上线，短短3年的时间，微博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2012年7月，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突破3亿。大量的机构、明星、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平民草根开通微博，由此成为近两三年来中国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社会现象。

微博是一个依托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终端发布简短信息与他人共享的传播网络。与传统媒体层层设置“把关人”以及传播内容的政治性、长篇大论不同的是，每条微博的容量只有140个字，但可以上载图片、视频，设置链接，日常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可以成为微博的内容。微博用户不受时间、地点、写作环境、写作格式的限制，只要有网络和信息发布的终端设备，微博用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地发布微博，也可以评论和转发别人的微博。在微博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作用相对弱化，使用的便捷性使得微博可以同吃饭、穿衣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话语权掌握在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记者、编辑、制片人或者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人手里，他们可以通过媒体展示立场、传达声音、表达诉求。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因为新闻媒体的属性和自上而下的宣传功能限制，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无法拥有生产传播新闻话语的权利。微博的低门槛进入和内容生产传播的即时性、便捷性，大大释放了普通人长期被抑制的话语权。普通人的日常话语经过微博核聚变式的传播后，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从2010年的“宜黄拆迁案”，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到去年以来媒体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主导的民间公益行动，如“微博打拐”“大爱清尘”“免费午餐”等都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媒体关注的宏观政治的新内容。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图鼓励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并实践言谈事件的声音的力量，并把这种手段当成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一种为自己发声的起点，让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能够自行渗透到自己的环境中，并利用这些声音来改变日常生活本身。“以往在政治活动中占据王座的宏观政治在后现代语境中正受到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微观政治的挑战。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差异性和边缘性的文化领域，重新估量性别、种族、民族、年龄、地域、生态等方面的权力关系，而这些权力关系是通过种种细微的通道渗入日常生活和个人存在的，更加贴近人们的命运遭际、人生悲欢，而它对于种种社会问题更能作出即时反应和积极干预，因而更真实更直接，也更加受到关注。”^[5]我们把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这个层面上传达的“政治”称为微观政治，也称文化政治。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考察的对象是镶嵌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权力关系而非宏观的国家权力、政党权力、阶级权力关系等。微观政治更多地与族裔、性别、年龄、地域、身份相结合，它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微博热点事件中的“微观政治”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文化身份的差异，人与人之间形成不同的群体，如因性别之差形成男性/女性，因财富之差形成富人/穷人，因地位之差形成精英/平民，因户籍之差形成城里人/农村人，因地域不同形成内地人/香港人，因性取向形成异性恋/同性恋等，“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6]。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各种身份差异，有多少种身份差异就有多少种权力关系。而“往往在不同的权力关系中，人们习惯性地认同一方优于另一方、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不平等的文化权力关系。”^[7]葛兰西创建的“文化霸权”（也译为文化领导权）理论对微观文化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核心主张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者社会阶级不仅仅靠武力统治而且靠认同形成对另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文化统治和压迫，并在

其中伴随着从属阶级的抵制和反抗。

在中国,因户籍之差形成的城乡分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效仿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意味着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建立,中国人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相比,毫无疑问获得了更丰富的人力、科技、经济、文化等资源优势。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教育、服务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方式的诞生地和集中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全社会确立起“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城市对乡村形成全方位的领导和控制,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文化权力关系。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城里人文明、富足、有教养,农村人愚昧、落后、举止粗俗,就连大众传媒也难以跳出这样的思维定式。从高晓声笔下的“陈焕生”到每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塑造的因知识浅陋而笑话百出的农民形象,长此以往,农民成为城里人忽略、轻视的对象。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城乡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长期在传统主流媒体中得不到释放。

此外,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其中最突出的表征。在国家的统计报告和传统媒体的宏观政治报道中,中国的贫困人口只是抽象的概念和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但实际上,大量生活在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双双焦虑的眼神组成的。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但在中国官方主导的慈善公益事业中,因其制度的不规范、信息的不公开、财务的不透明而备受社会各界诟病,这些在传统主流媒体中鲜有涉及,却在微博空间持续发酵。2011年,因“郭美美”事件,中国官方主导的慈善公益事业遭遇重创,社会捐赠不断下降,也由此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王克勤团队、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腾讯网共同发动的“大爱清尘救助中国尘肺病农民患者的公益行动”和邓飞联合500多名记者以及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免费午餐”民间公益行动,在微博上下掀起了民间慈善公益的热潮。

王克勤、邓飞都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调查记者,他们主导的微博公益项目是针对生活在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人,也即在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中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人。在这些民间公益项目中,救孤助人、公开透明、公正平等成为核心价值。王克勤主导的“大爱清尘”公益项目针对的是来自农村的尘肺病人。据媒体报道,“中国已经处于尘肺病高发时期,病死率高达22.04%。由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尘肺病人基本上拿不到他们该有的赔偿,而全国除了云南水富县以外,都没有将尘肺病纳入到新农合,600万尘肺病人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8]邓飞主导的“免费午餐”项目针对的是贫困地区的学童,致力于帮助因家庭贫困而没有钱享受营养午餐的学生。在微博上,微博用户之间可能彼此陌生,但是凭借相似的文化身份、相近的兴趣爱好、互相认同的价值观等形成一个个虚拟交往圈。尽管绝大多数微博用户没有机会成为两会代表,为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的调整直接施以影响,但普通人在微博空间对于慈善公益项目的关注、转发和评论,使得这些项目得到网络上下浩大的舆论支持,从而不断向前推进。自2011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基金”启动以来,已筹款422万多元,支出200多万元,共救助全国267名尘肺病患者。截止到2012年6月30日,“免费午餐”总共接受网友捐款3100万元,覆盖161所乡村小学,惠及超过25000名贫困小学生。正如“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所言:通过微博筹款、宣传、项目监督,给公益带来了新的手段。通过与民众进行交流互动,能够更轻松地召集人财物的资源,进行建设。微博也能倒逼我们不断提高专业化,不断公开透明。目前,“大爱清尘”“免费午餐”微博民间公益项目对国家层面的政策也产生了影响,2011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正式提出议案要由各地政府统一承担所有尘肺病农民工的治疗费用。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农村、贫困、弱势群体等都属于与国家、阶级、政党等不同的微观文化政治,以此为诉求的民间微公益行动,依托微博空间话语集结的力量爆发出巨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带动了国家宏观政治

层面政策的修订和完善。

德国政治家诺尔认为，微博是一种“数字民主”。微博作为公众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激发了中国普通百姓潜藏压制的公民意识，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参与到网络中去，对公共事件、国家民主开放、社会发展等话题发表意见和评论。王克勤认为“微博是有突破力的公民媒体，正在全面地启蒙公众，用阳光和曝光的力量来对付邪恶和犯罪，从而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9]在今年的“山西吃空饷女县长”“湖南湘潭神女局长”事件中，当事人都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而引发网民围观，微博集结了千万普通网民的话语，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导致当事人受到相关处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镶嵌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不断爆发影响力，在推动反腐倡廉、政府信息公开、网络问政、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彰显威力。

三、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关系

自2010年“宜黄强拆事件”以来，微博作为微观政治的生发地，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有了“围观就是力量”的微博动员口号。当前，新闻学界都普遍认同在中国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国家电视台、电台、新华社等为主体的体制内的舆论场，另一个是以网络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如果两个舆论场重叠程度越高，在现实层面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越强。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两个舆论场会呈现出不同的话语，这两种话语也体现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既博弈又合作的关系。

“吴英案”是今年的微博热点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博弈关系。2007年2月10日，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被浙江省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8年11月14日，金华市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起诉吴英。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提起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吴英被判以死刑是否恰当”，一时成为2012年春节之后微博空间的热门话题。笔者于今年7月16日在新浪微博搜索关于“吴英”的相关微博，显示有449万多条，可见该事件的关注度之高。除了法学界的专家在媒体中频频发声，任志强、李开复、潘石屹、薛蛮子、易中天等微博上活跃的知名人士，还有很多普通网民都借助微博表达了类似意见，即“吴英罪不至死，应刀下留人”。2012年4月20日，备受关注的吴英案死刑复核有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5月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案作出终审判决，浙江省高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吴英个人全部财产。

宏观社会政治关乎国家、政党、阶级之间的权力之争，一般会采取激烈的对抗形式，甚至会诉诸于暴力；形成武装革命，这是一种强硬的刚性政治，如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叙利亚革命等。微观文化政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身份、性别、文化价值的差异和矛盾，但不涉及暴力；微观文化政治是一种文化讨论，是一种微观政治意识和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批评，是一种相对平和的柔性政治。在我国，法律、制度、司法属于宏观政治的范畴，“吴英案”的改判与微博空间持续不断、声势浩大的舆论影响密切相关。在这其中，除了有“意见领袖”的作用外，更多体现为千万普通网民微观话语的聚集。这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时代是难以实现的，而在开放发展的互联网初期，舆论的力量也难在短期内聚集形成影响力。吴英免于死刑并引发金融制度、相关法律制度的讨论则是微博空间生发的微观政治对宏观政治施以影响的一种体现。

微博空间的微观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宏观社会政治的走向，如释放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职能转化等。但微观政治不等同于也不能取代宏观政治，常常受制于宏观政治。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兴起,微博已经为中国人开辟了一块“言论相对自由”的空间,但在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宏观政治依然具有绝对的主导和权威。2011年底,国家发布《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新浪、腾讯、搜狐及网易四大微博在2012年3月16日全部实行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的推行则进一步规范和控制了微博空间的话语表达。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用户通过微博传播不实信息、网络水军引发暴力话语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视。2012年3月31日至4月3日,新浪和腾讯关闭微博评论功能,清理谣言和其他非法信息。

在我国,传统媒体长期以来以宏观政治遮蔽微观政治,普通公民的话语权长期得不到释放,但微博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生成了大量与传统主流媒体不一样的舆论,公民积压话语的释放某种意义上成了社会压力的减压阀,但也唤醒了普通人的公民意识,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政府要认识到微博空间的微观政治对于宏观社会政治的合理和完善不乏补偏救弊作用,能对宏观政治的改良和进步起到平衡和牵制的作用。但微观政治的实行也必须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借助恰当的方法,在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微观文化政治)会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10]。近期,微博空间的不同人士因意见不和频现“对骂”“约架”的情况,这极大地损伤了微博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影响力和新媒体的公信力,如果微博用户不能自律,提升自身的公民素养,那么微博“微观政治”的影响力将会锐减,这将不利于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在新浪上线,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粉丝量就突破72万(截止2012年8月21日)。其大多数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量都达到上千次,有的突破上万次。“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晚安。”人民日报微博于8月5日23时36分发出的这条微博获得了其自开博以来最多的关注。该微博一共获得了13万多次的转发和近4.3万条评论。人民日报作为体制内的媒体,一向是以宏观政治的宣传报道为主。而其新浪微博的运行,则更多体现了党报对网络自媒体空间以微观话语传达的微观政治的重视。大量的网民从与党报隔膜到微博互动,从话语割裂到话语交融,由此也显示了两个舆论场之间有了重叠,也体现了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合作与交融。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2] 朱光磊. 政治学概要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绪论 6.
- [3]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 (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3.
- [4] 童兵. 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 [N]. 人民论坛, 2012-05-01 (04).
- [5] 姚文放. 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 [J]. 文学评论, 2011 (3): 17-25.
- [6]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 [M]. 陶东风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43.
- [7] 姚文放. 文化政治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 (2): 160-169.
- [8] 匡萍. 600 万尘肺病人挣扎死亡线 记者发起公益行动 [EB/OL]. <http://news.sina.com.cn/s/2012-06-10/085924567265.shtml>.
- [9] 微博围观改变中国 [EB/OL]. <http://www.psychcn.com/psylife/201102/1050048923.shtml>.
- [10] 范永康. 超越后现代文化政治—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的后期走向及其启示 [J]. 东方丛刊, 2010 (2): 135-143.